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3 May 2005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大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8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年

2005 年 5 月 21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 2005 年 5 月 20 日在“何塞·马蒂”反帝广场上发表的题为“不同的行为”的讲话（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48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奥兰多·雷凯霍·夸尔（签名）



## 附件

### 2005年5月21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不同的行为

### 2005年5月20日古巴共和国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在“何塞·马蒂”反帝广场上发表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

我即将向大家宣读的讲话是根据我们档案中的大量文件所拟订的。在这方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很多同志提供了合作。我依照昨天的承诺，在今天下午6时作好宣读讲话的准备。我把讲话的题目称为“**不同的行为**”。

**1997年4月12日：**一枚炸弹在 Meliá Cohíba 旅馆的“Aché”迪斯科舞厅内爆炸。这是 Luis Posada Carriles 在中美洲建立的、由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支助的网络，对古巴旅馆进行一连串恐怖袭击中的首次攻击事件。

**1997年4月30日：**内政部的特种部队设法拆除了 Meliá Cohíba 旅馆 15 楼发现的炸药引信。

**1997年7月12日：**Capri 旅馆和 Nacional 旅馆几乎同时发生爆炸，造成四人受伤。

**1997年8月4日：**Meliá Cohíba 旅馆发生恐怖爆炸。

**1997年8月11日：**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董事会发表了一项自我陶醉、冷嘲热讽的消息，表示旅馆内的爆炸事件为“过去几个星期在古巴不断发生的内部反叛事件”，而且，“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 [……] 对此毫不迟疑和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

**1997年9月4日：**Copacabana 旅馆、Chateau 旅馆和 Tritón 旅馆以及在 La Bodeguita del Medio 发生爆炸。在前几轮的旅馆爆炸中，一名年轻意大利旅客 Fabio di Celmo 被炸死。

从 1992 年 10 月 17 日至 1997 年 4 月 30 日进行的恐怖行动中，共计有 13 宗针对旅游设施的严重恐怖行动，大部分这些行动是由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支助。根据这项情报草拟了一份报告，由 5 月初对古巴进行私人访问的一名杰出的政治知名人士送交美国总统。

在此之前，已通过美国驻哈瓦那利益科（美国利益科）向美国政府送交了大量照会。

**1997年10月1日：**晚上11时，美国利益科主管迈克尔·科扎克打电话给外交部，转达来自第三国的情报，表示在以后24小时内，即10月1日或2日可能对哈瓦那或哈瓦那附近的旅游设施进行另一次炸弹攻击。他说他无法证实这项情报，但他希望我们知道这项事件。

**1997年10月2日：**外交部在早上召见美国利益科主管，以更详细了解日前的情报，并正式感谢他转递情报。

**1997年10月5日：**外交部召见科扎克，使古巴方能够向他宣读以下信息，并给了他一份信息副本：

“关于10月1日或2日可能对哈瓦那的一处旅游设施进行炸弹攻击的情报，我国表示，虽然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但已证实这项情报绝对正确，而且攻击的特征类似以前的计划。

“由于美国当局可能对情报来源感兴趣以及情报来源可能对美国当局有用，我国希望通报美国当局：向他们提供这项情报的来源已证明是可靠的。我国根据要求采取了最谨慎的行动。我国特此表示感谢”。

美国利益科主管回答说，向他提供的情报很有用：他们获得了这项情报，可是由于这是谣传，因此无法加以证实。以后他们可以更加相信来源；他在下个星期天将前往华盛顿，并把这项他认为积极的情报带上，如果他们从这个来源获得更多的情报，他们就知道怎么做；他们在美国进行的调查中没有发现更多的线索，可是，特别是在《迈阿密先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他们会继续在中美洲进行这些调查。他说如古巴有任何情报可以提供给美国，将会是很有帮助的。他最后表示：“这样做很好”。

**1998年3月7日：**美国利益科主管要求紧急会见外交部人员，以转达一些敏感的情报。他说他从不指明的可靠来源获得情报，表示有一批古巴流亡者有计划在3月7日和8日在古巴境内进行一次炸弹攻击。他不知道地点、时间或具体目标，但根据情报来源，炸药已经藏在古巴。

**1998年3月9日：**外交部长会见美国利益科主管，并向他宣读以下照会：

“关于3月7日上星期六口头提供的情报，表示古巴流亡者计划组织恐怖攻击，攻击可能在本月7日或8日执行，而且炸药已藏在古巴，我国愿意向你通报如下：

“1. 这点再次证明，美国当局关于这些活动的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3月4日上星期三下午，古巴拘捕了四名来自国外的人，并没收了他们的炸药和他们计划进行四次恐怖攻击所用的其他材料；这些攻击类似以前发生的攻击，组织方法相同，行动方式一样。有人答应每个炸弹付给他们一笔一定数额的现金。

“3. 古巴当局正设法搜集尽可能更多的情报。

“4. 这些罪恶行为极为严重，不但影响了古巴和美国，还影响到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我们有责任防止肆无忌惮地进行这种行为。如古巴和美国通过适当的机构协调打击这些行动的斗争，这点是不难做到的。在一些贩毒案件中，两国完全认真和谨慎地进行了协调。

“5. 至今我们尚未向公众透露这项情报，以待采取某些措施和完成我们的调查，但时机成熟时，不可能避免向公众提供这项情报。

“6. 我国衷心感谢贵国向我国提供的情报”。

在宣读完照会后，科扎克的最初反应是感谢古巴当局，并对古巴当局的办事效率表示祝贺。他又表示，如果我国有任何更多的情报或线索可以传达给美方，使其能够根据这些情报或线索确定是谁在支持或控制这些活动，将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美国政府已作出坚定的决定，不论谁是这些行动的可能负责者，都会追究到底和执行法律。科扎克坚称他们仍然没有关于谁是这些行为的幕后、主脑人的情报；有几个人有进行这种活动的记录，但并非所有这些人在迈阿密居住、工作或过境，或甚至在美国过境；有些人住在其他国家，所有这些因素使美国政府更难对他们采取行动；美国政府明确表明，这些恐怖行为对谁也没有好处。列席的另一名美国利益科官员又表示，他们认为拉贝罗上校关于取得萨尔瓦多人与中美洲的某人之间的电话谈话录音的说明引起大家极大兴趣；这项情报会非常有用，因为这样可以更容易地确定控制这些活动的人的下落。他们又说，在中美洲的战争之后，这些国家仍然有很多极右派的人参与犯罪活动。他们确实了解到能够证实他们的来源可靠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理解到在该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会见结束时，他再次坚称大家交流任何情报都是很有帮助的。

**1998年4月18日：**鉴于上文提到的积极交流以及了解到作家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不久将动身到美国会见他以前会见过的威廉·克林顿 William Clinton (象世界上很多其他人那样，克林顿是他作品的读者和仰慕者)，我决定托他向美国总统转达一项我亲自草拟的信息。

有关信息扼要和综合地谈及7个题目。在这次讲话报告中，我将仅报告与当前发生的严重事件直接有关的题目，即从美国组织和支助的针对古巴人民进行的恐怖袭击。信息题为：

##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克斯可以向克林顿总统机密转交的问题摘要

### 要点 1 (照原义), 一字不易:

“一个重要问题。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利用中美洲雇佣军继续策划和支付针对古巴的恐怖行动计划。在教皇访问之前和之后, 进行了两次在旅游度假胜地放置炸弹的新企图。在第一次事件中, 肇事者失败, 他们能够逃脱, 乘飞机返回中美洲, 留下的技术工具和炸药后来被古巴当局没收。在第二次事件中, 带着炸药和其他工具的三名雇佣军被拘捕。他们是危地马拉人。如每一个炸弹爆炸成功, 他们会获得 1 500 美元的报酬。

“在两宗事件中, 他们都是由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组织的集团的特务雇佣和提供装备。现在, 他们正在策划和采取步骤在古巴的飞机或运载游客来往古巴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其他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放置炸弹。有关的方法相类似: 在飞机内的某个地方藏上一个小型的强力爆炸装置, 由一条信管通过一个能够提前 99 小时预定程序的数字钟控制, 然后轻易地听由飞机飞往预计的目的地, 听天由命。爆炸将在地面发生或在飞机飞往下一个目的地途中发生。有关程序真的很邪恶: 机制、部件等容易处理, 几乎无法侦测, 操作使用方面无须很多训练, 几乎绝对可以逍遥法外。对航空公司和旅游设施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设施极为危险。有关工具适合犯罪, 非常严重的犯罪。如果透露这些工具和公开其可行用途, 就可能象以前劫持飞机那样沦为一种流行的恐怖袭击工具。住在美国的其他古巴裔极端集团正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美国调查机构和情报机构掌握关于负责的主要人物的足够可靠情报。如果他们真正愿意, 他们可以及时防止这种新的恐怖主义方式。如美国不履行其打击这种行径的基本职责, 就无法制止这种恐怖方式。不能单独由古巴承担打击恐怖主义的责任, 因为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能也成为这种行径的受害者。”

**1998 年 5 月 7 日:** 加布里埃尔在白宫的会晤。

###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克斯关于应要求向克林顿总统转达信息的任务报告

原文一字不易转录:

“3 月底, 当我向普林斯顿大学确认我在 4 月 25 日举办的文学讲习班时, 我通过电话与比尔·里察森联系, 请他安排一次私人访问克林顿总统的机会, 以讨论哥伦比亚局势。里察森叫我在启程一个星期之前打电话给他, 以便给我一个答复。几天后我前往哈瓦那, 以便为我将撰写的有关教皇访问的新闻报道收集一些资料。与菲德尔会谈时我提到会见克林顿的可能。就在当时菲德尔想到了转达一项保密信息的计划, 说明古巴刚发现的阴谋恐怖计划不但可能影响到古巴和美国, 还可能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为了避免迫使克林顿因作出答复而要面对的困境, 他本人决定信息不应是一封私人信件; 他选择提供一份我们关于有关阴谋计

划和关于其他共同关心的题目的谈话书面摘要。除了摘要文本外，他建议，如情况合适，我可以另外向克林顿提出两个非书面问题。

“那天晚上，我开始了解到我到华盛顿的旅程已发生了不可预测和重大的转变，我再也不能够将旅程看作是一次单纯的私人访问。因此，我不但向里察林证实了我的抵达日期，我在电话上还向他宣布：我还给克林顿总统带来紧急信息。为了尊重商定的保密原则，我在电话中没有提到谁是信息的传达者——尽管他一定会猜得出来是谁——我也没有透露延迟转达信息可能成为重大灾难和无辜民众牺牲的根源。我在普林斯顿停留的一个星期期间，他没有给我答复。这点令我想到，白宫也在考虑我当初请求的动机已经改变的事实。我甚至想到有关会见不会得到批准。

“我在5月1日星期五到达华盛顿后，里察森的工作人员立即在电话上告诉我，表示总统不能接见我，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会停留到5月6日星期三，而我则计划在5月6日之前一天启程到墨西哥去，可是他们建议我会见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萨姆·伯杰，他可以代表总统接受我的信息。

“我恶毒地怀疑他们正在附加一些条件，使信息传达给特勤处而不是给总统本人。1997年9月，我在白宫椭圆型办公室会见克林顿时伯杰在场，他有关古巴局势的几句话并没有违背总统的话，尽管我不敢说他毫无保留地赞同总统的所有意见。因此，我不觉得我获得授权自愿接受由伯杰而不是由总统接见的备选办法，但最大的原因是这是一项非常敏感的信息，而且不是我的信息。我个人意见认为，这项信息只能送到克林顿本人手上。

“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告诉里察森的办公室，表示如果改变对话者的唯一原因是由于总统不在，我可以延长在华盛顿的停留时间，等他回来。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会通知我。不久之后，我在旅馆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事务主任詹姆斯·多宾斯大使留下的电话便条，可是在他们正在处理我关于等待总统回来的建议期间，我假装没有收到便条。

“我不必焦急。在充满田园风光的普林斯顿校园，我已经写出了二十多页有用的回忆录，而且在毫无个人性格的华盛顿旅馆内，写作速度并没有放缓，我在旅馆房间内一天写作多达10小时。然而，尽管我拒绝承认，我闭门不出的真正理由是保管放在保险箱中的信息。在墨西哥机场，由于要看管我的个人电脑和手提箱（里头装着我正在写作的书的草稿和软磁盘以及没有副本的信息原件），我丢了一件外套。光是我可能丢了信息这个想法就令我不寒而慄，不是因为实际的丢失，而是因为人家很容易查明信息的来源和目的地。因此，我在继续写作期间，专心保管信息，进餐和接待访客都在旅馆房间内。我完全不相信保险箱，因为它没有密码锁，只有一根似乎是从街角便利商店买来的钥匙。我总是放在口袋中随身带着，而每次不得不离开房间之后，我会检查文件是否仍然放在密封的信封内。

我已经重复阅读了信息这么多遍，几乎已经全部记下来，以便在转达时必须解释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能够让自己放心。

“在那些日子，我一向假定我的电话通话以及我对话者的通话都被窃听。然而，我放松自己，因为我意识到我正成为一个不可指责的任务的一部分，这个任务对古巴和美国双方均有利。我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我不能与任何人讨论我的疑点，不然就违反保密原则。古巴驻华盛顿外交代表费尔南多·雷米雷斯愿意全力为我效劳，使我与哈瓦那之间的通讯渠道保持通畅，但是，从华盛顿的保密通讯这么缓慢和危险（尤其是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们之间的通讯只能通过一名特使解决。得到的答复是礼貌地要求我在华盛顿等待，为了完成任务，要等多久就等多久。这点一如我所料；同时，对方又客气地请我千万小心，不要因不接受萨姆·伯杰作为对话方而冒犯他。信息即使没有署名，但风趣的结尾让谁也猜得出作者的身份：我们祝愿你能够大量写作。

“无独有偶，前总统切萨尔·加韦里亚幸运地与托马斯·麦克·麦克拉蒂在星期天晚上安排了一次私人晚餐。麦克拉蒂刚辞掉他作为克林顿总统拉丁美洲问题顾问的职位，但他仍然是克林顿总统最年长和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前一年见过面，而加韦里亚家庭后来策划晚餐有双重目的：与麦克拉蒂讨论哥伦比亚隐晦不明的局势以及满足他妻子了解我书中某些要点的愿望。

“机会似乎是上天给的。加韦里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和一名很聪明的顾问，为人精明能干，对于拉丁美洲局势的透彻了解不下于任何人，并且对于古巴现实情况是一名机灵和同情的观察员。我在商定的时间之前一小时到达他的住所。由于没有时间进行协商，我冒昧地向他透露我的任务实质，以便能够给我指点迷津。

“加韦里亚向我点出了问题的真正分寸，为我化解了迷团。他向我表明，由于由一名美国总统通过非正规渠道亲身接受这种敏感情报涉及到的政治和安保风险，克林顿顾问采取的措施是最正常不过的。他不用解释，因为我立即记起有关的一件案例：1994年发生的大逃亡危机期间，我们在马撒葡萄园岛晚餐时，克林顿总统授权我提起这个问题和其他紧急的古巴问题，但他首先警告我说，他连一个字也不能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多么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说，以及他必须作出很大努力，避免对一些高度敏感的题目作出答复。

“加韦里亚又提请我注意一项事实：伯杰是一名精练和认真的官员，在与总统联系时必须采取步步为营的做法。他又向我表明，单是指派他会见我这点已经是非常特殊的高级礼遇，因为象我提出的这类私人请求一般拖延经年累月才传到白宫的外围办公室，或转给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的初级官员。无论如何，加韦里亚似乎很肯定交给伯杰的信息一定会转到总统手上，而这点是基本的。最后，正如我梦想的那样，他向我宣布，说晚餐结束时他会让我单独与麦克拉蒂相处，因此，他会为我打开一条通往总统的直接渠道。

“晚上的日子轻松愉快，很有收获：因为只有加维里亚一家和我们。麦克拉蒂象克林顿一样是南方汉，两人为人均象加勒比民族那样友好、平易近人。在晚餐上，很早就已打破隔膜，首先谈到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特别是贩毒问题及和平进程。马克也非常了解情况，他连我去年9月会见克林顿总统的最轻微细节情况都知道，当时我与克林顿总统深入讨论在古巴上空击落飞机的事件，并在当时提出意见，即利用教皇访问古巴期间的机会，由他作为美国调停人。

“麦克拉蒂似乎愿意为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关系作出努力；他对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关系的一般立场是：美国政策必须作出彻底改变。他说美国政府愿意与任何当选的总统接触，以便为争取和平真正努力。可是他以及我后来会见的其他官员对于究竟可能作出什么改变没有任何明确的看法。对话很坦率和流畅，因此，当加维里亚和他的家人离席，让我们在餐厅单独相处时，麦克拉蒂和我就象两名老朋友一样。

“我毫不犹豫地对他透露了给他总统的信息内容，尽管他没有了解到残暴的细节情况，他没有掩饰他对恐怖计划的忧虑。我没有把我会见总统的要求告诉他，但他答应待他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后，就立即与他联系。轻松的对话鼓舞了我，我竟敢建议他陪我一起去会见总统，并表示我希望不会有其他任何官员在场，这样我们就可以无话不说。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永远不知道为什么）：里察森是否知道信息的内容？我说他不知道。后来谈话结束时，他答应我会找总统谈一谈。

“星期二早上我通过正常渠道向哈瓦那报告在晚饭期间所讨论的主要事项，并冒昧提出一个适时问题：要是最后总统不接见我和把任务分配给麦克拉蒂或伯杰，我应向他们之中那一位传递信息？似乎适宜向麦克拉蒂传递信息，但总要小心行事不致冒犯伯杰。

“那天我在 Provence 饭馆与麦克拉蒂夫人吃中饭，因为在加维里亚的家吃晚饭时不能讨论文学。不过，她注意到的问题很快就一一答复了，只是她对古巴的好奇没有得到满足。我据我所知澄清一切，随后她觉得较为轻松。在吃甜品时，她没有离开桌子就座给丈夫打电话，他告诉我没有与总统见面，但希望当日能转告一些消息。

“不到两小时后，他的一名助手通过塞扎·加维里亚的办公室通知我第二天麦克拉蒂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位高官将在白宫开会。我想要是萨姆·伯杰是其中一人，他们会提到其姓名，现在我为此感到关切，恐怕他不会在场。这在什么程度上是因我没有注意到窃听电话而出了问题？但现在没有关系，因为麦克拉蒂已与总统作出安排，他应已知道信息。我马上作出未经商定的决定，不再等下去。我会赴会，将信息传递麦克拉蒂。我感到安心，于是订了第二天下午5时30分直飞墨西哥的航班的飞机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哈瓦那就我最近的协商给予我一生中最坚决的承诺：‘我们信任你的才干’。

“定于5月6日星期三,上午11时15分在白宫麦克拉蒂的办公室举行约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三位经点名的官员接见我:理查德·克拉克,多边事务主任兼关于国际政策的所有题目,特别是反恐和缉毒的总统顾问;詹姆斯·多宾斯大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美洲国家间事务高级主任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问题总统顾问;杰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洲国家间事务主任兼古巴问题特别顾问。我没有机会询问为何伯杰不在场。这三名官员彬彬有礼,十分专业化。”

“我没有随身带着个人笔记簿,不过我知道信息的全部细节,并在笔记簿中写下恐怕会忘记的事项:没有载入两个案文的问题。麦克在另一个房间快将开完会议。当我们等待时,多宾斯告诉我对哥伦比亚的局势不容乐观。他的情报和麦克拉蒂在星期一吃晚饭时所说的相同,但他似乎较为熟悉。我前年告诉克林顿美国的禁毒政策导致哥伦比亚的历史性暴力变本加厉。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没有提到我的具体措辞——显然同意应改变方针——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很小心,避免发表有关政府或目前候选人的意见,不过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局势非常恶劣,且未来不稳定。我对改进局势的目的不太高兴,因为注意到关于我们政局的华盛顿观察家提出令人不安的评论意见:‘目前他们真正想帮助,他们就更加危险——他们其中一人跟我说——因为他们什么都要插手。’

“麦克拉蒂进来衣冠楚楚,很有礼貌,但看其匆忙的样子,好像中断什么头等大事来跟我们周旋。不过,他谈笑风生,给会议带来平静的气氛。在吃晚餐的那个晚上,我喜欢他在谈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这次会面,他同样直视对方。他热情拥抱对方后,坐在我前面,双手按着膝盖,一开口就用一般措辞适当说出听来真实的话:‘我们为你效劳’。

“自始我想说明我是以作为作家的个人身份说话,没有任何其他功劳或任务,特别是涉及古巴这个既引起争议又引人注目的话题。因此,我开始讲话时确切地表明:‘这不是正式访问’。

“他们全部点头和显示出我未料到的严肃神情,令我诧异。接着,我用平常讲话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何时、如何和为何我与菲德尔谈话,导致我应传递克林顿总统的非正式笔记。我将放在密封的信封内的笔记交给麦克拉蒂,并请他阅读,以便我可以就其发表意见。这是关于7个题目的英文本,共6页,隔双行:恐怖计划;对3月20日声明恢复美国和古巴之间航班令人满意的措施;理查森1998年1月访问古巴;古巴拒绝人道主义援助的理由;承认五角国防部对古巴军事局势表示赞同的报告;核准伊拉克危机的解决;赞赏克林顿在曼德拉和科菲·安南面前发表关于古巴的评论意见”。

如我所料,

“麦克拉蒂没有高声阅读笔记。要是他事前认识到内容，无疑就会这样做。他读给自己听，显然使用经肯尼迪总统推广通用的阅读方法，但其面色好像水中的光不断转变。我也曾阅读多次，因此深知其表情如何随着文件中的各点转变。

“第一点有关恐怖阴谋，令他发出哼声，喊叫‘真吓人’。后来，他露出淘气的笑容，边阅读边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想他指的是第四点，提到一伙参议员谋划阻挠托雷斯·兰热尔和多德的法案，并对克林顿为挽救该法案所做的努力表示赞扬。

“在阅读完毕后，他把笔记递给多宾斯，接着轮到克拉克阅读，这时麦克称颂莫蒂默·朱克曼，《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编辑兼出版人，他在2月曾到哈瓦那访问。他就刚刚读到文件的第六点发表评论意见，但没有回答关于是否朱克曼告知克林顿他曾两次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相谈12小时不明言的问题。

“阅读后用几乎全部时间讨论恐怖密谋这一点，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告诉他们，在哈瓦那获悉有关炸弹爆炸一事，在飞往墨西哥途中我要克服恐惧。我认为此时适宜提出菲德尔所建议的第一个个人问题：联邦调查局能否就联手反恐斗争与其古巴对口人员联系？在他们能够反应之前，我自己补充一句：‘我保证古巴当局会很快和积极作出反应。’

“我对四位人士迅速的强烈反应感到惊奇。克拉克似乎对问题较为熟悉，说好主意，但告诫我联邦调查局在调查过程中，不处理在报章报道的任何案件。古巴是否会保守秘密？由于我很想提出第二个问题，我给他们的答复有助于使气氛松弛：‘古巴人最爱保守秘密’。

“由于第二个问题没有适当动机，我决定肯定该问题说：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可为导致恢复美国人到古巴旅行建立有利气氛铺平道路。但此举反而弄巧成拙，因为多宾斯误解我，说采取3月20日的措施时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澄清误解后，我谈到从要求我帮助他们在古巴做生意或消遣娱乐的许多美国人和各阶层人士所承受的压力。在这方面，我提到唐纳德·纽豪斯，各种杂志编辑兼《美联社》社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讲习班结束后，他请我参加其在新泽西州的郊外宅第举行丰盛的晚宴。他目前的梦想是到古巴旅行，与菲德尔讨论建立类似有线电视新闻网常驻哈瓦那的美联社办事处。

“我不敢肯定，但看来在白宫进行热烈谈话时，很清楚，他们没有或不知道、或不愿意透露当前重新让美国人到古巴旅行的任何打算。我应强调绝对没有提到民主改革、自由选举或人权、或美国人作为任何与古巴合作项目的条件的政治老套。相反的，我对这次旅程的最清楚印象是在集体意识中正在开展的和解进程肯定不可逆转。

“当谈话离题时克拉克叫大家重谈正题，或许作为信息，指出他们会就美古反恐计划立即采取步骤。在其笔记本的冗长记录中，多宾斯最后写，他们会同美驻古大使馆通讯，执行项目。我用讽刺的口吻评论他所排列驻哈瓦那利益部门的等级。多宾斯满风趣地回答：‘这不是个大使馆，但比大使馆远为大得多’。众人都狡笑起来。由于不合时宜，再没有继续讨论，不过我假定他们会后来进行分析。

“整个会谈，包括麦克迟到的时间持续了 50 分。麦克用礼仪套话作为结束语说：‘我知道你返墨西哥前的行程非常紧凑，我们也有很多事要处理’。他随即作简短表述，好像正式回应我们的努力。在此不宜冒昧试行逐字引文，不过，按词句的精神和语调，他对信息的重要性表示赞赏，值得美国政府充分注意，并会紧急处理。他以作为圆满结束这次聚会的方式，直视我的眼睛，夸赞我说：‘你的任务实际上至关重要，并且你顺利执行’。无论我是过度害躁，或是毫不谦虚都不会因昙花一现的光荣而得意忘形，不顾花瓶里藏着传声器。

“我离开白宫，深信所做的努力和过去几天患得患失都是值得的。虽然未能亲自向总统传递信息，感到不快，但这可由通过非正式有效的聚会导致硕果来补偿。同样的，知悉克林顿和麦克的关系密切和两者的友谊始自小学，我确信文件早晚会传到他的手里，在晚饭后安逸的气氛中阅读。在聚会结束时共和国总统显示出有风度的姿态。在办公室外，一名差役给我传送一个信封，内载六个月前我访问总统办公室时拍的照片。因此我在返回旅馆途中，唯一感到失望是未能在春光明媚时目睹或欣赏樱桃树开花的奇妙景色。

“我几乎没有时间整理行装，还差点误了 5 点钟的飞机。14 天前我乘坐的那架飞机由于涡轮机受损，不得不折返基地，我们在机场等了 4 个小时才等到了另一架飞机。在白宫开完会后，我乘坐返回墨西哥的飞机，该机装满乘客后，在华盛顿搁置了一个半小时，为了是修理雷达。5 个小时后，即在墨西哥着陆之前，我们不得不在该城上空盘旋了近 2 个小时，因为有一个跑道无法使用。这是自我 52 年前首次乘坐飞机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但这对于在我记忆中占有特殊一席之地的和平冒险之旅而言，情况也只能这样。1998 年 5 月 13 日”

这些就是有关历史背景情况。

**1998 年 5 月 9 日：**美国利益科代科长 John Boardman 拜会了外交部。目的是转递一项信息，即 5 月 8 日夜晚他们接获指令要其将此信息转递给阿拉尔孔和外交部。他说不知是怎么回事，但知道古巴政府让美国政府了解古巴当局有充分理由关切以美国为基地的组织制定了对古巴开展恐怖行动的计划，特别是针对旅游业，更具体的是将对进出古巴运送游客的民航班机发动攻击。

他们转递美国政府的答复如下：

- “● 美国政府没有掌握美国公民与旅馆发生的恐怖行为之间有任何联系的情报。新闻界是在猜测，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情报。

- “● 美国政府发出多次外交照会，表明愿意分析古巴政府为证实这一情报而提供的任何信息或物证。
- “● 美国政府愿意重申这是一项认真的意向。美国政府准备听取任何情报，以了解是否有可能派美国专家检查古巴政府在这方面提出的任何物证。
- “● 美国政府对这些恐怖行为表示关切，愿意就这一情报采取行动，以加强法治并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 “● 美国政府请古巴政府分享从其他国家政府获得的有关情报，以了解从各国领土飞往古巴的航班发生恐怖行为的危险。”

**1998年5月11日：**Remírez 报告说，国务院召见他 与 John Hamilton 会面，后者向其提出了以下各点：

“(1) 会见的目的是重申美国利益科在上一个星期六提出的要求；其中包括答复了我国对以下问题的关切，即有人利用两手外交的花招，煽动针对古巴的恐怖活动。

“(2) 他们和以前一样，认真看待我们对旅游设施和飞机可能遭到恐怖袭击的关切。

“(3) 根据他们进行的调查，没有情况显示有关计划源自美国。

“(4) 过去，当我们指控在美国的人和/或组织参与了针对古巴的恐怖行为的时候，他们均要求我们提供证据，以便调查。

“(5) 这次他们愿意强调，美国提出进行调查的意向是十分认真的，从而根据我们可能掌握的证据采取适当行动。这并不是想把皮球踢过来，但也不是一项正式的意向。

“(6) 他们认真提出对我们可能掌握的证据进行联合调查，并采取后续行动以便澄清事实。我们感谢他们的此一意向，并保证我们将把这一情况上报我国当局。我们还问他们这项意向是否包括两国在进行最终调查时所进行的合作，Hamilton 回答说，他认为是这样。Hamilton 重申这是一项认真的意向，不单纯是外交意义上的答复，接着又说，这一重要问题是会晤的唯一目的”。

**1998年5月12日：**外交部召见美国利益科代理科长，并转达了对该科在9日星期六代表美国政府提出要求的下列答复：

记得于加保会见是在8日，就在白宫。我方的答复是：

“我们所获情报是可靠的，但该情报来自于不能透露的敏感来源。我们不能如贵国所建议的那样做。我们满意地获悉贵国已提高警觉，并注意这一问题”。

美国利益科代科长接受了这一答复，并感谢我方迅速作出答复。他说他愿意把我方认为有关的、但不损害消息来源的情报上报。他随行同伴，美国利益科负责法治和安全事务的官员也讲了话，向我们保证他们将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通过其所有机构、并通过与各种团体保持接触的方式非常密切地追踪此事。他们将与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进行调查。他说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任何这类性质的威胁都是不能容忍的”。

**1998年5月20日：**阿拉尔孔接到身在华盛顿的 Hamilton 打来的电话。Hamilton 说他之所以亲自给阿拉尔孔打电话是因为问题十分重要以及他希望提出以下要点：

- “● 关于针对飞往古巴飞机的恐怖行为的风险：他们非常认真地看待古巴传递的情报，将对飞离美国的飞机采取安全措施。
- “● 为了采取其他行动，他们有必要分析我们在古巴搜集的证据。他们愿意向古巴派遣美国专家，与我们进行分析。
- “● 仅凭从我国得到的情报，他们不能对有飞机前往古巴的国家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决定发出此类警告，我们可以告诉这些国家美国愿意立刻予以注意并应邀为避免任何此类事件提供技术援助”。

**1998年6月3日：**美国利益科科长 Michael Kozak 与阿拉尔孔会面。他说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代表团正准备访问古巴。然后，他递给阿拉尔孔一份美国计划发给各航空公司的文件，供古巴方面阅读。该文件内容如下：

“我们收到未经证实的情报称，有人计划在古巴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之间飞行的民航上安放爆炸装置。这一阴谋涉案人计划把小型爆炸装置安放在飞机上并打算在飞行当中引爆。据报告说，该爆炸装置体积小，配有一个引信和可在引爆前定时 99 个小时的数码定时器。但尚未查明具体目标、地点和时间范围。

“我们不能排除这一威胁也针对来自美国的国际货运航班的可能性。美国政府仍然在寻找更多的情报，澄清、核实或驳回这一威胁”。

**1998年6月4日：**阿拉尔孔奉命答复说，该代表团可在6月15日之后前往古巴。

**1998年6月5日：**阿拉尔孔向美国利益科科长递交了古巴的答复，这份答复是我本人为拟议印发的“美国情况通报”起草的，全文如下：

“我们并未要求贵国向各航空公司发出警报。这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不同的措施。”

实际上，我们已采取许多措施保护飞机的安全，主要是在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这几个星期。直至后来给予他们迎头痛击：将他们逮捕，发现了他们的所有计

划，所有被逮捕的人都招了供，从而使人们了解了一切细节，予以揭发并摧毁了他们的计划。是古巴摧毁了这些计划的。因此，我们告诉他，为此我们还向他解释说：问题不是面对这个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并且必须采取其他措施。

“没有人能保证万无一失。对这一问题任意作出决定可使调查更加困难，并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设置障碍。

“此外，发出这种警告可能导致恐慌，从而对古巴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而这正是恐怖分子所希望的。这一损失也祸及各家航空公司。

“因此，我们不同意发出警告，我们认真严肃地反对这样做。我们可以与贵国专家组深入分析所应采取的最可行步骤。”

事实上，如果她想这么做，就应显示出客气或礼数与我方就即将转发的通知进行协商。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我方的观点。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利益科科长指出对第一个信息可能存在误解（他们以为我方请他们发出警告）并认为美国当局可能在法律上有义务提醒航空公司，从而避免可能产生的损失索赔案。他说他将把古巴的立场转达给华盛顿，并说他们将不会发出警告。

**1998年6月6日：**阿拉尔孔和美国利益科科长举行了另一次会议。后者转交了美方对前一天收到的文件作出的答复，在早些时候科长曾在电话中将此答复念给阿拉尔孔，答复称：

“1. 提供给古巴方面的报告草稿已命名为“情况通报”。根据美国航空法律规章，在美国政府得到有关飞机可能受到威胁的可信情报之时，必须向航空公司国内安全办公室提供情况通报。”

他们解释说，的确有法律法规要求他们发通知。事实上，完全可以讨论怎样做，但不是提供我们在口信中所指出的所有数据资料。

“2. 联邦航空局每年约发布 15 到 20 份情况通报。这些通报并不是公开文件。”

当然，这些通报不是公开的；但如果你发布成百上千份文件，就会在各地引起恐慌，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调查，重要的是进行调查、举证、揭露并缉拿罪犯。但我还必须指出，我有可能不了解这些要求须发出通告的法律。

“3. 根据我国法律规章，我们必须将此事立即通知有飞机直接或通过第三国间接来往于美国和古巴间的航空公司，并通知第三国政府。只要我们认为情报是可信的，在这方面别无选择。”

是的，情报必须是可信的，我们有了解情况的来源，说明了我们告诉他的答案，情况确认我们得到的数据准确无误，我们逮捕了一些罪犯，但其他罪犯则逃脱。

“4. 鉴于这一情报的性质，并鉴于我们有义务与其他国家合作以防止攻击飞行器的事件发生，我们仍认为贵国或我方必须通知来自其他目的地的航空公司以及有关国家政府。如果古巴方面有可能把专家会议提前到下个星期初（即星期二或星期三），在我们有机会与古巴方面证实这一情报之后，我们将建议发出此种通知。如果提前开会不可行，我们将着手发出此一通知。在6月15日那个星期的专家会议期间，还可确定采取何种进一步的步骤。”

的确，这是6月6日的通知。在15日召开会议并不是临时决定的，也不是两天就能准备得好的，至少需要5天或6天；因此，不可能将会期提交到7日，会议后来真的在15日举行，也就是早就定下的日子。

“5. 我们赞赏古巴当局提出的几项要点，我们力求避免损及调查并力求避免对航空公司和古巴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我们正尽最大努力在我国法律规章给予的有限酌处权范围内，以及本着我们优先重视防止攻击民用航空飞机事件发生的原则，尊重上述各个要点。我们再一次指出，这些“情况通报”是例行公事，就我们的经验，即使公布于众，一般也不会对旅客或货物的空运产生重大或持久性的影响”。

事实上，我必须说，他们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每个问题。我认为，这种交流是出于好意，而非恶意。我们试图深化这种交流，我们也看出他们在提到有某些法律文书迫使他们这样做时表现出的固执态度。

在同一天，阿拉尔孔向美国利益科主管递交了外交部草拟的以下新请求：

“我国不同意。可能公布这项情报会破坏调查工作，满足恐怖分子及鼓励其针对古巴经济进行的阴谋计划。

“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理解有这样的法律义务；因为这种义务不但不利于为避免牺牲生命和物质破坏所作的努力，还可能影响这些努力。

“详细公开这种行动所使用的方法程序将大错特错，只可能有利于积极活动或潜伏的恐怖团体的阴谋计划”——我国不希望公布情报，因为这样做等于提供有关如何准备攻击的技术数据。“我国尊重美国当局的标准，但不同意美国当局打击这种活动的方式，认为必须根据现成的情报，对这种活动进行必要的谨慎和全面分析。”

现在大家已明确地理解到，无可怀疑的是，他们担心出事或发生这类颠覆行为，而他们虽然掌握情报，但却没有向航空公司通报，哪怕这样做完全于事无补，因为航空公司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的手段和背景以及情报避免这种恐怖行动。

美国利益科主管表示他已经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多宾斯先生谈过，他要求提出以下补充意见：

- “● 依照国际协定，美国当局根据美国法律有义务通知从美国飞出的航空公司以及飞往古巴的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他们决定提出这项警告这点表明，他们非常重视我们的情报，并认为情报可信。”

他们对此感到极大不安，因此立即传播了有关情报。

- “● 关于文件第 4 段，多宾斯坚持我们不要任意将其理解为施加某种压力。有关的情况是，他们有义务立即通知从美国飞出的航空公司，虽然也有义务通知从其他国家飞出的航空公司，但是压力没有那么大。然而，不能将情报保留一整个星期不发放。理论上，专家会议可以作出结论，认为威胁并不是逼在眉睫。可是，由于他们出发的前提是认真考虑我们的情报并证实其可信性，因此他们不能老是等待而不履行义务。”

对于他们之间的这些交流对话的诚意，我完全没有疑问。我必须承认，他们对两方面都很认真这点是对的。

**1998 年 6 月 8 日：**联邦航空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这点我们已经提过。换言之，那天几乎就在两天后。

**1998 年 6 月 15 日：**联邦调查局代表团到达哈瓦那，以便同古巴当局进行联系。

**1998 年 6 月 16-17 日：**古巴专家与联邦调查局的美国官员就恐怖攻击阴谋计划的题目在哈瓦那举行了几次联席会议。古巴向美国联邦调查局代表团提供了大量书面情报和证词。移交的材料包括 64 页情报，说明古巴对 1990 至 1998 年期间针对古巴的 31 宗恐怖行动和计划进行的调查情况。大多数这些行动可以直通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还组织和资助最危险的行动，特别是由在中美洲的 Luis Posada Carriles 指使的恐怖组织执行的行动。有关材料包括详细清单和武器图片，在每次行动中缴获的炸药和工具。此外，还递交了 51 页情报，说明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向不同恐怖团体提供金钱、进行反古巴活动的情况；联邦调查局还收到 Luis Posada Carriles 打出的 14 次电话通话录音，他的通话透露了关于对古巴进行恐怖攻击的情报。为了确定 Posada Carriles 的下落，还提供了他的住址、经常出没地点、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和巴拿马所使用的汽车的型号和车牌等情报。又提供了在古巴被捕的恐怖分子的 8 项谈话录音誊本；他们在谈话中透露了他们与 Posada Carriles 的关系。

联邦调查局官员又获得 60 页关于 40 名古巴出生的恐怖分子的档案，他们大部分住在迈阿密；还提供了如何找到他们的资料。联邦调查局官员又带走每份两

克重的爆炸物质抽样三份，这些抽样是来自 1997 年 4 月 30 日 Meliá Co hiba 旅馆内和 1997 年 10 月 19 日在一辆旅游面包车上拆除的未引爆炸弹以及 1998 年 3 月 4 日从两名危地马拉恐怖分子身上没收的爆炸装置。

他们又获得 5 卷录像带和 8 卷录音带，其中有被捕的中美洲恐怖分子关于在旅馆放置炸弹的声明。在这些声明中，他们供出他们与以美国为行动基地的反古巴恐怖组织的关系，特别是他们与 Luis Posada Carriles 的关系。

美国方面承认他们获得的情报的价值，并承诺尽早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后作出答复。

奇怪的是，几乎三个月已经过去，美国方面还没有依照承诺作出认真的答复。古巴方面只收到一些无关重要的消息。

**9 月 12 日**——请注意，还不到三个月，有 5 名同志——古巴共和国今天的英雄（鼓掌）——被拘捕。他们在迈阿密部署，是了解针对我国恐怖活动情况的主要情报来源。哪里都没有拘捕任何恐怖分子，最后却拘捕了我们提供情报的同志。虽然以前没有任何人员能够确定情报来源的真伪，可是他们能够了解到情报是认真和可靠的，我们的检举是有根有据、一点不差的。然而，这不是特殊的情况，而是涉及基本问题。

他们其中一人的任务正好是负责追踪 Orlando Bosch 的活动，此人尽管罪恶滔天，可是在迈阿密却逍遥法外。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迈阿密的秘密犯罪组织头子风闻古巴当局与美国之间就肆无忌惮针对我国进行的残暴恐怖行为进行联系和交流，因此动用他们一切可以动用的巨大力量和影响力，阻碍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谁是破坏这些接触的主要负责人？是联邦调查局驻迈阿密站站长 Héctor Pesquera。当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的准军事团体直接组织的突击队在波多黎各岛附近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截获、没收了其快艇和武器并加以拘捕时，他刚好也是驻波多黎各站站长。在我国应邀出席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人人都知道这个在 Margarita 岛上的突击队的目标是什么。

Pesquera 这个秘密犯罪组织的成员，是确保恐怖团体完全逍遥法外的关键人物。

据称联邦调查局内的最高层对于中断与古巴的交流的建议有一定抗拒，可是秘密犯罪组织头子们的权势和政治影响力占了上风。他们虽然占了上风，因为连美国总统和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也受其影响。

毫无疑问的是，联邦调查局已经在跟踪古巴的反恐小组，而该小组掌握的关于有计划在地面或飞行途中引爆飞机的情报，我已提供给美国总统。这种可怕的

行动可能牺牲古巴公民和美国公民的生命，因为他们很多人乘坐这些飞机来古巴旅行。

联邦调查局驻迈阿密站长 Pesquera 集中全力确定、追踪和起诉古巴人。他们对古巴爱国者给予的残暴待遇是众所周知的。

根据《新先驱报》1998年9月15日的报道，Pesquera 第一时间向国会议员 Ileana Ros-Lehtinen 和 Lincoln Díaz-Balart 通报了拘捕我国 5 名英雄的情况。

Pesquera 本人在迈阿密的一个电台节目中作出的承认可以证明他是如何从波多黎各到达迈阿密，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对付这个打进迈阿密恐怖组织的古巴小组的：

“我是在同年即 1988 年 5 月到达迈阿密的。我与当地有关人员建立联系。然后我们开始深入调查。为了搜集情报起见，我不应留在波多黎各。我必须改变方向，因此进行一项犯罪调查。”

根据作出的决定和我接到的命令，我不必侦查情报活动，但必须对古巴爱国者进行犯罪性质的调查。

我国追随完全不同的路线。1998 年 10 月 19 日，在葡萄牙波尔图举行的一次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上，我接受有线电视网 CNN 记者 Lucía Newman 访问时，向她明确指出——他们犯下了我们前所未闻的法律上的荒唐行为。当时是 10 月 19 日，即在拘捕了我们几名同胞一个多月之后：

“我国愿意进行合作，共同打击可能影响到古巴或美国的恐怖活动。

“美国正面对数百个极端组织可能造成的危险，因为很多这些武装组织就在美国境内，他们对付古巴使用的一些方法也可能用于美国，因为有些组织组织严密，手段厉害”——我是指有关方法、程序和技术方面。“我国向美国当局作出了表示，向他们作出了通报，传授了我国的经验和恐怖分子对付我国的恐怖方法。这种贡献有助于美国当局采取防卫措施，因为我认为美国是很容易受到这类攻击的国家。”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当 Pesquera 和他的爪牙恶毒地对古巴人进行跟踪、拘捕和起诉等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时，在 9 月 11 日攻击纽约两座塔楼和其他目标的 19 名参与者中，有 14 名就住在他主管的地区，在他的眼皮底下活动和进行训练。

在我国不怕牺牲和英勇的同志被捕后不到三年，数千名无辜的美国人在 2001 年那个不祥的日子牺牲生命。可是，这些同志搜集得来的情报，我国提供给美国人民，这样可能挽救了很多美国人民的生命。换言之，实际上在他们被捕不到三

年后，数千美国人在纽约丧生，他们是袭击的受害者，而大部分的行为者是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训练的。

如我国同胞和国际舆论可以观察到，我国解密的文件中没有删除一个字。

在结束讲话之前，我希望指出，在公开报告之前，我征求过报告作者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克斯的意见。就在昨天，我向在欧洲的他发出了信息，在信息中转达下列内容：

“我不得不讨论的题目是，我请你传达的关于针对我国的恐怖活动的信息。此举不会影响到收信人，更不会影响到你的文艺光辉。

“基本上这就是我传达的信息以及你以你的鲜明风格给我写出来的精彩报告。这些就像我的回忆录，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的回忆录不包括有关信息，就不算是完整的回忆录”。

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我在讲话开头谈到“不同的行为”。

古巴人民与美国人民友谊万岁！（群众高呼：“万岁”）

为祖国不惜牺牲！

我们必胜！

---